

古文献视域下的商周礼乐器青铜铙研究

阙烁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商周青铜礼乐器铜铙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物质见证，其形制、功能与文化内涵在传世典籍、甲骨文及历代注疏中均有深刻体现。本文以“二重证据法”为研究框架，系统梳理《周礼》《诗经》《礼记》等经典文献中的铜铙记载，结合殷墟甲骨、青铜器铭文及考古实物，探讨铜铙在礼制、军事、祭祀中的多元功能。同时，通过对汉代至清代学者注疏的考辨，揭示铜铙研究的学术史脉络。研究表明，铜铙不仅是商周社会等级制度的物化象征，更是中华礼乐文化“器以藏礼”哲学思想的典型载体，其古文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互证为重构早期中国音乐史提供了关键支点。

关键词： 青铜铙；礼制功能；互证

Study on Bronze Cymbals of Shang and Zhou Ceremo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Literature

Que Shuo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The bronze cymbal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re the material witness of the early rites and music civilization in China. Its shape, func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re deeply reflected in the handed down classics, the oracle bone and gold inscriptions and the ancient notes. Based on the "double evidence method"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cords of bronze cymbals in Zhou Li, The Book of Songs, Li Ji and other classical documents, and discusses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bronze cymbals in ritual system, military service and sacrifice, combined with the oracle bone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objects in Yin ruin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cholars' notes from H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bronze cymbals is reveal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ymbals are not only the materialized symbol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ut also the typical carrier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carrying the instruments to conceal the rites" in Chines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Th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its ancient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provides the key fulcru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music history.

Keywords： bronze cymbals; ritual function; mutual proof

引言

铜铙研究的文献学意义青铜铙作为商周时期“金奏”礼乐的核心器物，其研究长期依赖考古类型学与音乐声学分析，而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尚未得到系统性阐释。事实上，《周礼》《礼记》等典籍对青铜乐器的礼制规范、甲骨文中的礼乐活动记录，以及历代学者对“铙”的考据注疏，共同构成了铜铙研究的文献学基础。

本文以“文献—器物—制度”三重维度展开研究：首先，解析经典文献中铜铙的礼乐功能；其次，考证甲骨文、金文中的铜铙使用场景；最后，梳理汉代至清代学者对铜铙形制与功能的认知演变。通过这一路径，试图揭示铜铙在中华礼乐文明建构中的历史角色。

一、经典文献中的铜铙礼制功能

1.《周礼》体系下的乐器分类与铸造规范《周礼·春官·大司乐》将乐器纳入礼制框架：“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其中“八音”之

“金”即指青铜乐器，铜铙属此类。郑玄注：“金，钟镛也”，（图1 青铜铙）

而《考工记·凫氏》详述钟类乐器的铸造标准：“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虽未直言“铙”，但其“厚薄适中”的声学原理适用于铜铙设计^[1]。

项目信息：2024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湖南商周青铜礼乐器铜铙研究”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4YBA274。

作者简介：阙烁（1989-），女，汉族，湖南人，博士，湖南工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音乐传统文化；钢琴演奏与教学。



>图1 笔者拍摄于长沙市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周礼·夏官·大司马》明确铜铙的军事用途:“卒长执铙。”郑玄注:“铙所以止鼓,军退则鸣铙以止鼓。”此记载与殷墟西北岗M1004出土铜铙伴随兵器埋藏的现象形成互证^[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0)。

2.《诗经》中的礼乐场景再现 《诗经·周颂·有瞽》描绘宗庙奏乐:“喤喤厥声,肃雝和鸣。”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喤喤”为钟鼓之声,是个拟声词,形容乐声清脆洪亮,“肃雝”表示乐声舒缓肃穆、和谐悦耳,“和鸣”指各种乐器相互应和而鸣,发出合鸣之声。考古发现显示,商代晚期三件一组的编铙(如妇好墓编铙)可奏出“羽-宫-角”三声音列^[3],其声学特性恰可产生“喤喤”的浑厚音效。这一诗史互证表明,铜铙在西周礼乐体系中仍延续着商代的功能传统和文化内涵:

祭祀文化:在先秦时期,祭祀是国家大事,《有瞽》一诗所写的宗庙合乐祭祖,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祖先的崇敬和追思,通过盛大而庄重的音乐仪式,祈求祖先庇佑子孙后代,国家繁荣昌盛。

礼乐文化:“喤喤厥声,肃雝和鸣”^[6]明《律吕正声》中的铙体现了“礼”的秩序与“乐”的和谐统 >图2

一。乐师们按照一定的顺序和规范演奏各种乐器,展示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也营造出和谐、庄重的氛围,起到了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3.《礼记》中的礼器象征体系 《礼记·乐记》强调“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将乐器纳入“器以藏礼”的哲学框架。铜铙作为“金奏”之器,其使用规格具有严格等级性。《礼记·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撤钟磬”,郑玄注引《三礼图》称:“铙如铃而无舌,执而鸣之。”(图2)

此描述与殷墟出土铜铙的甬部中空、需植于座上演奏的特征完全吻合。^[4]

二、甲骨文与金文中的铜铙实证

(一) 甲骨文中的“奏庸”与“多铙” 殷墟甲骨中有多处涉及铜铙使用的记载:

《甲骨文合集》31022:“癸亥卜,贞:翌甲子奏庸,不雨?”

郭沫若释“庸”为镛(大钟),但陈梦家(1956)提出“庸”可能包含编铙,因殷墟墓葬中常见编铙与镛共出^[5]。如郭家庄M160出土三件编铙与一件镛钟,印证“奏庸”实为编悬乐器的合奏。

《甲骨文合集》22294:“……卜,贞:多铙……”

此条“多铙”记载与妇好墓五件成编铙形成对应,说明商代晚期已存在多件组编铙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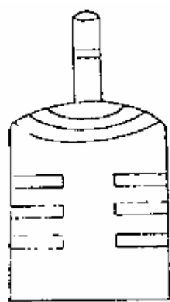


图2 明《律吕正声》中的铙

(二) 青铜器铭文中的礼乐实践 西周金文进一步揭示铜铙的礼制功能:

小臣觶尊铭文(商晚期):“王赐小臣觶贝,唯王来征人方……彤日。”

铭文记载商王征伐人方后行彤祭,殷墟M1004出土铜铙与钺、戈同置,说明铜铙兼具军事凯旋与祭祀功能。

速钟铭文(西周晚期):“速作朕皇考觶钟,用追孝侃前文人。”

虽为钟铭,但“觶(和)钟”概念可溯至商代编铙的组合使用。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的音列结构(宫-角-徵-羽)与殷墟编铙存在承袭关系^[6]。

三、历代学者的注疏与考辨

(一) 汉唐注疏:形制与功能的初步认知

郑玄《三礼注》提出“铙如铃而无舌”的经典定义,准确描述铜铙的演奏方式(执甬鸣击)。《隋书·音乐志》引陈旸论乐:“殷人制铙,以节戎事”,反映早期学者对铜铙军事功能的重视。

(二) 宋元明清:金石学视野下的突破

吕大临《考古图》(1092年)收录“周舞铙”,虽误断年代,但首次图示铙的形制特征(卷十)。引之《经义述闻》(1797年)考《周礼》“金鐃”即铙类乐器,纠正前人“鐃于”说。吴大澂《愙斋集古录》(1896年)结合音律研究,提出商铙音阶“合于宫商”,开音乐考古先河。

(三) 近现代学术转型

考古学与多学科交叉:罗振玉《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年)



>图3

首次将安阳出土铜铙定为商器,推翻“周器说”。容庚^[7]《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确立铙与钟的演化关系:“殷墟之铙,周人易甬为钮,遂成钟制。”

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互证

(一) 殷墟妇好墓出土五件编铙(图3)

通高14.4-19.7厘米,重1.6-4.6公斤。测音显示其音列构成四声徵调式音阶。墓中编铙与青铜礼器、玉器共置,印证《礼记·祭统》“礼器备则祭祀隆”的记载,体现墓主(商王武丁配偶)的特殊身份。

（二）南方大铙与《尚书》地理叙事 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四虎兽面纹大铙（通高68厘米，重51公斤）（图4）

其纹饰融合中原兽面纹与南方虎图腾，与《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的记载形成地理呼应。这类南方风格铜铙的发现，修正了传统“中原中心论”，证明长江流域存在独立的青铜礼乐文化圈^[8]。



图4 笔者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

五、学术争鸣与未来研究方向

1. 定名之争：从“钲”到“铙”的认知演进 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将此类器物定名为“钲”，郭沫若^[9]据殷墟出土实物改称“铙”，但林已奈夫（1976）提出南方大铙应另称“镛”。当前学界多采用“铙-镛”二分法：甬部短小者为铙（中原型），甬部长粗者称镛（南方型）。

2. 功能演化：礼器、乐器与军器的三重角色 安阳郭家庄M160出土铜铙与钺、戈同置，说明其兼具军礼功能；而三星堆祭祀坑铜铙与象牙、玉璋共出，凸显祭祀属性。这种功能分化反映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特点^[10]。

3. 音律体系：从三声到五声的演进之谜，殷墟编铙呈现三到四声音列，而西周编钟已发展出五声至七声音阶。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铭文“自作秣钟”暗示音律观念的转变，但商周音阶体系如何衔接仍需更多测音数据支持。

六、结论

通过对古文献与考古实物的系统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作为商周礼乐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铜铙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构建起解读上古礼制体系的密钥。这种青铜重器不仅是“器以藏礼”思想的具象化呈现，更在文化传播与学术认知层面展现出多重历史维度，成为透视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棱镜。

在礼制维度上，铜铙的铸造与使用完美诠释了周代“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等级秩序。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套编铙，其28.5公斤的体量与三层云雷纹饰，彰显着王室贵胄的威仪；而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三件套素面铙，则通过简化的形制表明诸侯的次级地位。这种“悬差序列”在《周礼·春官》“小胥掌学士之徵令，正乐县之位”的记载中得到印证，考古发现中从三件到五件不等的铙器组合，恰与天子、诸侯、大夫的等级差序形成对应关系，构成青铜时代礼乐制度的物质注脚。

文化交融层面，南方大铙的考古发现颠覆了中原中心论的传统认知。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象纹大铙，通高103厘米、重221.5公斤的庞大体量远超中原同类，其独特的浮雕式兽面纹与中原的阴线刻划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地域性差异在埋藏方式上更为显著：中原铜铙多出自贵族墓葬，而长江流域的窖藏现象暗示着特殊的祭祀传统。考古类型学研究表明，南方大铙既有对中原器型的模仿，又在纹饰布局（如湖南浏阳柏嘉铙的乳钉纹）、合金配比（铅含量普遍高于中原）等方面展现创新，揭示出礼乐文化传播中的在地化重构过程。

学术认知的演进轨迹则折射出中国学术范式的现代转型。东汉郑玄在《周礼注》中将铙归为“金奏”之器，开启了经学传统下的名物考据；至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始用实测法记录铜铙尺寸，孕育出实证研究的萌芽。1935年郭宝钧殷墟发掘首次运用地层学判定铜铙年代，标志着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蜕变。这种从经学注疏到科技考古的认知转型，恰是中国学术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切片。

铜铙作为“藏礼”之器，其物质形态承载着礼制规范，空间分布记录着文化互动，研究历程映射着学术演进。这种三维度的历史价值使其超越普通文物范畴，成为解码早期中国文明基因的关键物质遗存。在青铜文明的星空中，铜铙犹如多棱的星辰，持续折射着中华礼乐文明的多重光谱。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整合青铜器铭文中的音乐信息，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分析铸造工艺，并在全球青铜文明比较视野中定位中国礼乐文化的独特性。

参考文献

- [1] 李纯一.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2] 王子初. 中国音乐考古学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 [3]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4] 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 [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6] 方建军. 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 [M].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 [7] 容庚. 商周彝器通考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8] 向桃初.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概说 [J]. 湖南大学学报，2007
- [9]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10] 杨向奎.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